

父亲『逼』我学会的本事

□李亚儿



AI生成图

父亲离开十多年了。平日里被生活推着四处奔波，只有父亲节、清明时节，我才会好好地想起他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心底都藏着一个执念：父亲好像从来都不爱我。家里三姐妹，我是老大，他一直把我当男孩来养。

记得那年村里统一给村民安装电灯，村民只需承担材料费、人工费就行。那天父亲对我说：“这几天家里的活先放一放，你跟着村里的电工，仔细看看他们怎么接线、怎么安装电表。看明白之后，咱家的电灯就由你来装。”

“我才14岁，连电灯都没见过，哪里会装啊？”我怯生生地回答。

“哪有人天生就会的？你听过长子代父吗？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长子。”

那时候家里家境贫寒，这笔安装费用对我们家来说，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支。父亲是想省下这笔钱。之后我天天跟着电工打下手，三天后，我亲手给家里装上了电灯。当我拉下开关，灯光瞬间洒满屋子的那一刻，我开心得跳了起来，心里满是成就感。

本以为这次特殊的锻炼只是偶然，没过多久发生的一件事，再一次挑战了我的极限。

那段时间家里屋顶总漏水，我只能拿脸盆接雨水。雨刚停歇，父亲抬头望了望天，搬来梯子对我说：“跟我上屋顶修补漏雨的地方。”

在父亲不容置疑的眼神里，我战战兢兢爬上梯子。屋顶又陡又滑，每往前挪一步，我都心惊肉跳。父亲紧跟着爬上来，在我身后示范：“其实这活儿不难。先把下层瓦片码放整齐，再铺上上层瓦片，对齐就可以了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生硬地补充：“以后再漏雨，你自己就能处理了。”

后来我长大嫁人，渐渐忘了自己本该是需要被呵护的女生。洗衣机出故障，我会直接打开后盖检修；电脑无法开机，我能快速拆开主机排查；拆解清洗电扇、给空调除尘，这些繁琐的活儿，对我来说都轻而易举。

我常在朋友圈晒自己做的美食，不管是朋友还是同学，全都不敢相信。她们总会不约而同地问我：“你居然还会做饭？”在她们印象里，我是从小被父母万般宠爱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。没人知道，我早已活成既能细心做针线家务，也能扛起体力重活的样子。

老房子住了20年，橱柜门摇摇欲坠，浴霸一开就跳闸，水龙头还总滴滴答答漏水。我和丈夫商量翻新房子，他嫌麻烦不愿意动工。经不住我反复劝说，他才勉强同意，前提是装修所有事宜他一概不管。

不管就不管。租房过渡、打包搬家，这些事我处理得顺顺利利。找装修公司、敲定设计方案、商谈价格、签订合同、挑选装修材料，全程都是我一人敲定。3个月房屋翻新完工，我满心欢喜喊丈夫过来查看。可他盯着浴霸满脸不悦：“谁让你装上浴霸的？忘了以前一开就跳闸的事吗？”

我连忙道歉：“是我疏忽忘了，那我们以后不用浴霸就好。”其实全屋线路都已经全部更换，根本不会再出现跳闸的情况，我只是懒得过多解释。

还记得那年夏天，母亲坐在屋檐下缝纽扣，我坐在她身旁看书。忽然母亲神色惊恐，失声大喊：“蛇……蛇……”一条两指宽的蛇，掉到了母亲的脖子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快步上前，一把攥住蛇尾狠狠扔向远处。母亲吓得说不出话，我抱着她不停安抚。想来是那天气闷热，蛇出来透气，不慎失足滑落，它当时想必也吓得不轻。

岁月匆匆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儿子从小喜欢手工拼装模型、修理各类玩具。当他第一次修好玩具车时，脸上满是兴奋与骄傲。那一刻，我的思绪瞬间拉回到家里第一次亮起电灯的夜晚，我与儿子彼时的心情，竟一模一样。

原来，父亲从来不是不爱我。他只是把深沉的爱意藏在严苛的教导里，悄悄为我披上了抵御世事的铠甲。谢谢您，我的父亲！

未完成的批注

□陈明霞

时间回到40多年前，那时我们住在三官堂，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那逼仄的小屋和两张拼在一起的书桌：一张是我的，另一张是父亲的。父亲是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的老师，他案头的灯光总是昏黄的，像一个隔世的梦。他的影子被这光剪裁下来，一半是清晰而嶙峋的瘦削，一半就融化在周遭无边的暗色里。

他永远握着那支老式的钢笔，笔尖在学生的作文本上，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篇习作，而是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里，只有他，和那些需要他一个字、一个词去扶正的人生。

那是他的世界，一个我很长时间不理解，长大后心痛，心痛到没有机会再去理解的世界。

快30年了，时间的尘埃足以湮没许多声音与面容，我逐渐很少想起他。

我以为自己淡漠，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在俗世里疾行的赶路人；我以为我想褪去他遗传给我的那层过于执拗、过于老实的壳。

可前两天，看到了斯舜威老师回忆我爸的视频，说起“我的老师”时，一股热流猝不及防地撞开了心中尘封的闸门，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来——为那个还被人记住的他，也为那个在我心里几乎被遗忘的他。

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，那些细碎的、硌得人心疼的片段，便如潮水般涌来。

父亲后来被调到院报编辑部工作，那份不过是几页油墨清香的刊物，在许多人眼里，也许是用来应付差事的，可在他那里，却成了一片需要精耕细作的田地，我曾偷偷翻看过的样稿，那些即将付印的版面，被他用红笔改得密密麻麻。“这里，逗号要改成句号。”“这个标题的字体，再小半号会不会更妥帖？”他在灯下自言自语，一把直尺几乎丈量了他的后半生。

连一个标点符号，他都不肯苟且。在他心里没有大事小事，他的认真近乎于固执，有时，一个居委会的简报也会找上他，父亲于是又折腾几个晚上。

他说：“总得对得起这几个字。”

他说“对得起”，不是对得起主编，不是对得起读者，甚至不是对得起作者。他是要对得起那一个个从心里流出来的汉字，仿佛每个字都有魂灵，而他就是那个安顿魂灵的人。

更让我揪心的，是我后来听说而

父亲从未提起过的那些事。大学的职称评定是老师们“性命攸关”的“战场”，父亲的同事们忙着发论文、整理自己的学术履历。而我的父亲，却在为一个他的学生——年轻教师评职称的申报材料，一字一句地润色，连续熬夜。

他一把把地扶着别人过桥，却忘了自己的路可能就泥泞不堪。

这些细节，30年后想起，依然会让我在夜里突然坐起身来，胸口堵着一团说不清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是心疼——心疼那个男人把一生的心血都熬成了别人的灯油。为什么一个对待文字像对待神明一样的人，却只能在清贫与寂寞中燃尽自己？

可就在我以为能看清这一切，能用“不值得”三个字为他的一生盖棺定论时，我却忽然发现了一个让我心惊的事实。

那些“不值得”，那些“太老实”，那些“何苦呢”，早已像一种无法剔除的基因代码，刻进了我的骨血里。

我审视自己。写一篇文章，我也会为一个标题斟酌半日；做一个PPT，我也会为一张配图的色调反复调试；有时半夜里我会忽然起来，只为改一个自己都觉得没人会注意的措辞。

对每一件事情极其认真——这句话，曾是我对父亲的墓志铭，如今却成了我自己的讫语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他不是我的伤痕，他是刻在我骨子里的精神图腾。

我站起身，想在满墙的书架间找一个答案。手指拂过冰凉的、整齐的书脊，却无意中触到一个本子，它被夹在两本大书的缝隙里，像一个沉默太久的秘密。我把它抽出来，翻开。

本子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全是父亲那清瘦的笔迹，每一个学生的成就，每一个学生发表的作品的下面，都用红笔标注着姓名、日期、发表情况，时间截止至1994年8月。那时，54岁的他身体突感不适，直至去世都未能重返岗位。

窗外，夜色如墨。这些往事，早已化作了泥土。可我分明感觉到，他就坐在我对面，目光温厚，一如30年前。

爸爸，你的那个世界，好像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我打开电脑，敲下这些文字，这些文字看着我，如他当年的目光，我终于可以说出那句话了——

我愿意成为你。



作者现存唯一与父亲的合影照，右一为作者弟弟。